

抵抗运动关于战后欧洲建设的目标与主张

严双伍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严双伍(1957-), 男, 安徽桐城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和欧洲一体化研究。

[摘要] 抵抗运动在反侵略、反暴政的同时, 也在积极勾画未来欧洲的蓝图。他们坚决主张摒弃民族国家的形式, 在联邦主义的原则下实现战后欧洲的重建。抵抗运动不仅使欧洲思想广为传播, 而且也使欧洲思想进一步丰富, 从而为战后欧洲联合创造了社会条件。

[关键词] 抵抗运动; 欧洲思想; 联邦主义; 欧洲重建

[中图分类号] K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3-0371-07

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 欧洲抵抗运动成功地把社会各行业、各阶层人士吸纳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在抵抗运动的构成中, 其中坚力量无疑是广大的社会中下层, 其精神领袖则是(二战前)非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同权势集团和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精英阶层相比, 这些人的思想最为激进, 最少患得患失。抵抗运动坚持斗争的环境是极其险恶的。纳粹占领者奉行的恐怖政策, 迫使抵抗战士只能报之以反恐怖(德国人正是把他们称为“恐怖主义者”)。这些选择了抵抗的人们, 其中部分必然是“牺牲的先行者, 注定了不能享受它的牺牲曾为之铺平道路的胜利”^[1](第338页)。抵抗组织的战士能够如此勇敢地面对危险, 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现存的秩序, 也是为了实现他们渴望的理想和价值。可以说, 千千万万的抵抗战士正是抱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投身到出生入死的斗争中去的。

一、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联邦主义思想

意大利抵抗运动中的欧洲观念最为浓厚, 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上升到理论层次, 其中尤以联邦主义思想为甚。

1941年2月, 被囚禁在文托泰内小岛上的意大利抵抗运动领袖E. 罗西和A. 斯皮内利, 在和一些狱友讨论的基础上, 发表了著名的联邦主义文献——“文托泰内宣言”。宣言号召联邦主义者组织积极联合起来, 为重获自由, “彻底铲除把欧洲分裂为各个主权民族国家的现状”, 以便“建立一个将成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范围内出现的最伟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创造物的新机体”。在宣言中, 作者还把欧洲的统一与维护欧洲文明联系起来, 提出了划分进步与反动的新标准。进步便意味着全力承担起保护“欧洲文明”的职责并把欧洲推向统一, 而反动则意味着与此截然对立。宣言发表后不久, 斯皮内利和罗西又分别先后发表了《欧洲合众国与不同的政治趋势》、《明天的欧洲》、《联邦主义者的各种倾向》等一系列宣传、讨论联邦主义的文章或小册子, 它们均通过地下机构秘密油印出来, 广泛传播到各地。

在意大利众多的抵抗组织中, 1942年成立的行动党是一个欧洲主义思想非常活跃的组织。该党的基本文件是1942年6月4日发表的“七点纲领”, 主张“废除国家主权”、“重塑国际关系和价值观念”,

“与所有民主国家进行密切和持久的合作”，然而他们设想的“欧洲联邦”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认为在战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培养一种“欧洲联合的意识”。行动党还草拟了一份“欧洲联邦国家宪法草案”，这是意大利人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欧洲联邦的宗旨、责任、权力和机构进行勾画的文件^[2]（第497-503页）。由于看法的不同，在意大利抵抗运动之间便出现了一场关于欧洲联邦的讨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纷纷在地下刊物上撰文，阐述自己的看法。1943年8月，在罗马的联邦主义者专门编辑出版了刊载讨论文章的《欧洲联盟》第2期。在这个集子中，罗西对行动党的“七点纲领”提出了直接的批评，认为它是“谨慎、中庸和不明确的”，如果消极地去等待一个“欧洲联合的意识在战后出现，势必将丧失建立联邦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罗西在回顾了少数优秀人物设法促进意大利统一的历史事实后，建议联邦主义者充分地“运用他们对获胜国家当权者的影响”，争取“参与对国际形势走向的控制”^[2]（第510-511页）。

这场讨论直接导致了意大利“欧洲联邦运动”（MFE）的诞生，该组织于1943年8月27-28日在米兰成立，是欧洲的第一个联邦主义者社团。罗西和斯皮内利被共同推举为欧洲联邦运动的书记^[2]（第514-519页）。

欧洲联邦运动以抵抗组织的喉舌《欧洲联盟》刊物为主阵地，不断宣传他们的主张和思想。以当时信息传递、收集之困难，应该说该刊无论是消息报道还是政论分析、理论探讨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广度。《欧洲联盟》刊载的文章涉及盟国政策、战后计划、意大利对外战略、跨国合作以及联邦主义在国内外的发展等方面。其中一些理论文章尤其引人注目。齐奥尔齐奥·帕伊罗纳尔的“联邦主义、地方自治权和自治”一文将国内的分权制与超国家联邦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斯皮内利的“意大利外交政策之路”，表达了联邦主义者同已获解放的南方政府的不同意见，认为南方政府的对外政策太过于民族主义化了^[2]（第534-536、169-170页）。在意大利全境解放即将到来的1944年初，罗马的地下组织出版了“文托泰内文件集”，并附有详细的说明介绍。该文集的出版，使斯皮内利的早期著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二、法国抵抗运动关于战后欧洲重建的主张

与意大利抵抗运动基本上以战前政党组织为中心的情况不同，法国战前社会的通常结构——政党、工会或团体等组织在大溃败后已不复存在，其各种各样的抵抗组织均是“围绕着地下抵抗”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绝大多数法国人选择了维希政府，贝当“得到了普遍的尊敬”。只是到纳粹独裁本质和维希政府真面目逐渐暴露出来后，法国国内有组织的抵抗运动才开始形成。与法国国外抵抗运动首先就高扬“民族解放”的旗帜不同，国内抵抗运动兴起时，主要表现的是政治理想的诉求，即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自由和道义而抵抗^[3]（第32页）。应当说，这种观念的形成同纳粹当局和维希政府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密切相关^[4]（第177-184页）。1942年，盟军登陆北非和法国南部自由区被占领后，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终于进入了高涨时期。为逃避被强征到德国作苦工，成千上万的人躲进森林和高山，汇入抵抗组织的队伍。维希政府为对付游击队，也专门成立了规模达25万人的保安队^[5]（第533-535页）。

法国早期抵抗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怎样确保战后的和平。亨利·弗雷内是1941年12月成立的“战斗”的领导人，这是法国最大的也是组织得最好的抵抗组织。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这批人的思想状况：“当两个主权国家陷入纷争的时候，国际联盟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只有当欧洲国家结成联邦，并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联盟巩固的时候，欧洲才会有和平。这就是为什么在194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当我在为‘小翅膀’刊物的下一期而工作时，我发现自己正在写道：‘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欧洲平等国家的联邦，也包括从自大狂病症中治愈的德国。’……这一关于欧洲的短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后来它为大部分抵抗组织所接纳。”^[6]（第91页）弗雷内的这一关于战后欧洲的设想，在1942年夏季被正式写入了该组织的纲领“战斗宣言”：“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欧洲合众国——作为通向世界联盟的一个阶段——必将很快成

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和其他各民族人民将创造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和法治基础上的联合的欧洲，以取代一个分裂并为德国强权所奴役的欧洲”^[7]（第76-79页）。进入1943年，法国许多抵抗组织纷纷对战后重建表明自己的态度。1943年9月1日，法国另一大抵抗组织“解放南方”在一篇题为“我们的任务：超越民族国家”的声明中呼吁，在战后，“为了确保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邦政府能够行使权力，民族国家的主权必须予以限制”^[8]（第76-79页）。“解放南方”的领导人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埃还具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要保证和平，首先，“那些在地理上、文化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应当组成一个联盟或联邦，彼此取消金融、关税、军事等壁垒并共同管理其共有的资源”；其次，“必须建立一个基于国际法的共同法院，依照联盟或联邦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来处理相互间的事务与问题”^[2]（第312页）。法国社会党的抵抗组织在1943年12月的“抵抗运动纲领草案”中提出，“欧洲合众国的建立应作为通向国际共同体的第一步，它应保证各成员国的自由、独立和全体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共同体内的各国具有属于自己的恰当的位置，譬如各自的历史、传统、风格、偏好和地方特色等。民族特性是人类和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不仅需要尊重，而且需要在共同体内养护。”^[2]（第333-334页）法国南部的第三大抵抗组织“自由射手”在其同名刊物上，强烈反对回归战前各国对垒的欧洲体系和“欧洲的巴尔干化”，在“埋葬法西斯极权制度和国家主权的废墟上，必须建立一个欧洲人民的联盟而不是国家的联盟”^[8]（第152-157页）。

在海外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1943年被国内抵抗运动承认其领袖地位），从政治倾向上说属于传统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他始终关心和追求的是法兰西的“独立、伟大”，并没有真正理解本土抵抗运动的目标和理想。只是在为了扩大力量和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情况时，某种程度上不得不部分地接纳了欧洲观念。1943年，在阿尔及尔，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担任该委员会军需与武器装备委员的让·莫内提出了一份报告，结论是“如果各国战后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重建，就必然会带来政治上彼此追逐强权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因此就不会有和平”。为避免这种局面，莫内建议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或欧洲实体，由它来组织一个共同的经济统一体”。次年，莫内在与美国《幸福》杂志记者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把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交由一个欧洲权力机构来管理”的设想^[9]（第50-51页）。1944年3月18日，在阿尔及尔临时协商大会上，戴高乐正式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为使复兴的欧洲大陆能有一个符合我们时代条件的平衡，我们觉得应该在欧洲建立某些集团，但各国的主权不应受到损害。”^[3]（第51-52页）他还列出了这个“西方集团”大致的范围，即从芒什海岸、莱茵流域到地中海的相关国家都可参与^[10]（第59页）。但戴高乐的这一建议不仅不明确，而且也毫无结果。

三、德国抵抗运动关于欧洲未来的构想

如果我们把抵抗运动的概念界定宽泛一些的话，即包括所有各类反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那么，意大利在1925年、德国在1933年就已出现了矛头直指本国政权的反抗活动。但由于德国作为法西斯的大本营，其思想控制和镇压措施、恐怖手段都极为严厉，同其它国家比较起来，不可能产生完全意义上的、有规模的、持久的抵抗运动，大多数抵抗均表现为个人或小团体的活动。但是，不论是早期开展斗争的极少数人，还是后期几乎所有的抵抗组织，都以欧洲联邦的形式来设计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开始了对赞成欧洲联合、主张和平的人士的迫害。当时持这一主张的人数尽管极少，但一度在德国非常活跃。随着法西斯专制独裁体制在德国的确立，有一些人预见到纳粹主义必定会走向对外战争。面对这一危险，他们开始思考欧洲统一的问题，设想一种欧洲人的联合体，在其中将废止国家主权^[2]（第363页）。以“新开端”命名的柏林左翼社会主义者组织，在德国最先创立了跨越边界的秘密地下网络。该组织在其《十点纲领》中提出，鉴于“欧洲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德法两国的敌视”，因此，“建立一个在德法和解基础上的欧洲联邦”，对未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2]（第372页）。

1941年，随着战争的大规模扩大，纳粹在国内的统治更加恐怖，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因素使得德国国内的抵抗小团体纷纷出现并向各地迅速发展。在抵抗组织中，联邦欧

洲的主要倡导者是那些非正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基督教徒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贵族领导的团体。“克劳塞集团”便是其中之一。该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他出身于著名的名将世家毛奇家族。该集团成员有政府官员、军人、宗教人士、前工会领袖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等,大多 30 来岁。1941 年 4 月,毛奇起草了一份题为“起点——目标——问题”的备忘录。他认为德国失败后的和平将带来“一个联合的欧洲主权国家”,“在这个联合的欧洲中,将包括一批小的非主权国家,……它们将至少拥有共同的边境海关、货币、外交和防务政策、立宪机构等,可能的话包括经济管理”^[2](第 382-388 页)。2 个月后,毛奇在一份“假设与问题”的文件中,将“单一主权的联邦欧洲”的疆界划了出来,那就是“西面北面以大西洋为界,南面以地中海、黑海为界,东面则以罗马尼亚、前波兰、巴尔干国家和芬兰为界”^[2](第 389 页)。在 1943 年 8 月“克劳塞集团”的“重建的基本原则”的声明中(该声明是作为希特勒垮台后重建的“第一指针”而起草的),他们强调“自由与和平的发展是与单个国家的绝对主权不相容的,和平要求创建一个超越现存国家的(欧洲)秩序”。至于一个联合欧洲的经济政策,应当通过控制重工业和运用金融、财政等手段,将单个国家经济整合成具有统一货币和共同关税的欧洲“经济统一体”^[2](第 367 页)。

1942—1943 年活跃于柏林的“欧洲联盟”组织,主要致力于帮助外国在德的劳工。他们的宣传口号极为鲜明:“让我们一起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欧洲并肩而战!”“为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联盟而斗争!”^[2](第 423-424 页)。曾经创立“白十字世界和平联合会”的天主教教士马克斯·约瑟夫·梅茨格尔(Max Josef Metzger),1943 年 6 月在给瑞典乌普萨拉福音派大主教的备忘录中表示,德国应转变到“一个民主原则下的自由国家联盟中去”,并被解除武装以支持“跨国防务力量来确保各国间的公正与和平,以及遵循欧洲合众国的合理组织秩序”^[2](第 424-425 页)。

欧洲观念在军队中流行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恩斯特·容格尔 1943 年夏季写于巴黎的《和平》小册子中窥见一斑。容格尔早年曾是一名帝国主义者,但后来却成了和平、欧洲联合和个人尊严的坚定信仰者和捍卫者。《和平》是为纪念他战死在意大利的儿子而写的。他在书中宣称:“欧洲联合的时刻已经到来,在联合中一旦德国为其错误的行为赎罪,那么建立在各族人民联合基础上的欧洲就将拥有主权和宪政机构。”^[2](第 369 页)同样早年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右翼保守主义者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在战争期间政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2 年 12 月,他为自己所领导的抵抗团体起草的“关于大西洋宪章的声明”,表明他已经从整个欧洲的立场和利益来观察思考问题。声明宣称:“战后自由国家创立的欧洲经济理事会应该通过关税同盟和经济合作逐渐为政治上的欧洲邦联开辟道路。”并认为“解除武装将可能导致一支共同的欧洲防务力量的建立,这是迈向超国家主义的一大步”^[2](第 369 页)。1943 年 8 月,格德勒在他提出的《和平方案》中,倡导“建立一种永恒的和平同盟,……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大国都不谋求主宰权”。他还设想建立一个“欧洲外交部”、一个“欧洲经济部”以及一支“欧洲军队”^[2](第 430-432 页)。这标志着格德勒的欧洲思想从“合作”层次跨入了“联盟”层次。到了 1944 年,他更完成了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最终转变。在《通向欧洲重建的可行性步骤》一文中,格德勒断言,“只有一种目标可以视作目前危机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我们必须坚定地着手创建一个基础深厚、生机勃勃的欧洲联合体”,“一劳永逸地消除欧洲(各国)的疆界”,使之成为“一个有机联合的联邦国家”。在经过适当的准备后,“欧洲总统将被选举出来”^[2](第 440-442 页)。容格尔和格德勒战时思想变化的过程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德国历史上那个最黑暗的年代,孕育在欧洲传统文明基础上的欧洲联合思想,正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

概括来说,在德国的抵抗运动中,关于战后欧洲的未来设想基本上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欧洲内部实施政治、经济的分散化,地方管理自治。这是从纳粹政治、经济体制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它与盟国酝酿的处置德国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倒是不谋而合;二是在经济上以欧洲各自由国家间的紧密合作取代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政策;三是为了确保和平,各自由国家必须建立具有执行机构的欧洲联邦。这个联邦不仅消除了各种经济壁垒、原有的国家疆界,而且拥有一支统一的军队,以维护欧洲的安全和秩序。

无疑，德国抵抗运动中的上述思想，是千千万万的人们经过巨大牺牲、痛苦反思方才获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像抵抗运动席卷整个除中立国之外的欧洲大陆一样，几乎所有国家的抵抗运动都表现出了或强或弱的欧洲主义意识，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这里不再一一提及。

四、为建立新欧洲各国抵抗运动之间的联合努力

要使战后的欧洲联合起来，抵抗组织十分清楚，他们自己必须首先联合起来。但险恶的环境和抵抗斗争的特点，使跨国交流极为困难。除非在战前彼此就很熟悉了解，否则一般很难发生交往。事实上绝大多数抵抗组织的活动只能局限在本地区之内。我们所知道的不同国家间抵抗组织正式签署的协定，除了日内瓦会议的几份宣言之外只有两份，这还是在战争最后阶段德国的控制不断削弱的情况下才实现的。一份是1944年5月，意大利东北部的“意大利阿尔托民族解放委员会”与铁托军队的代表签订的互助条约，另一份也是同年5月，意大利皮埃德蒙的抵抗组织和法国马赛地区的“抵抗统一运动”组织签署的协定^[11]（第379-384页）。

早在1941年，各国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及其精英几乎用一致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共同认识，这就是“从英吉利海峡到爱琴海”正在进行的抵抗战斗是一个整体——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共同的敌人，他们都对人类尊严和法治原则抱有同样的信念，他们都把创建欧洲联邦（或某种欧洲组织）视为消除过去纠纷、永葆欧洲和平的唯一途径。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亨利·弗雷内，常常向自己的同胞介绍德国人抵抗希特勒的新情况，他还建议所有欧洲抵抗组织建立一个联合机构。1944年3月26日，弗雷内在“战斗”组织的一次大会上指出：“欧洲被占领的每一个国家，其抵抗运动的目标和希望同我们是惊人的相似。本来也是，我们怎么会有真正的差别呢？！年年月月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遭受同样的困苦，冒着同样的危险，进行同样的战斗。为了同样的自由和正义的理想与共同的敌人及其（反动的）价值观念战斗。此外，他们和我们一样认识到，分裂是虚弱的根源，我们明天的力量一定来自于联合”^[12]（第321页）。同样，德国的毛奇和“克劳塞”集团坚信，“欧洲合作要成为可能，必定依赖于欧洲精神价值的复活，依赖于全体欧洲人为基督教义、人性和社会主义的超国家理想所作的斗争努力”^[13]（第201页）。毛奇为同各国抵抗运动建立联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先后与挪威的埃温·伯格格拉夫主教，荷兰领导人范·阿斯贝克、G. J. 斯科尔顿，以及波兰克拉科夫大主教萨皮耶哈取得了联系，向他们转达“克劳塞集团”有关联邦欧洲的设想计划。毛奇相信，抵抗运动的共同目标将为未来提供所必需的团结。他认为“与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在战争期间的联系都是实践欧洲政策的一部分，是为新欧洲的重建在作准备”^[12]（第201页）。

联邦主义的代表人罗西和斯皮内利更是积极寻找各国抵抗运动联合起来的机会。他们看中了瑞士作为中立国的地位可予利用的可能，希望在这里召开一次各国抵抗运动领导人的会议，制定出一个战后欧洲的共同计划。他们认为欧洲各国的抵抗运动应该从战争中获取教益，达成共识，而一个共同计划的制定，不仅可以统一各国抵抗运动的认识，而且将使他们的观点对盟国的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1943年秋，两人带着这一目的来到了瑞士。经过许多努力之后，1943—1944年冬季，以“致全体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公开信”的发表为标志，终于形成了一个部分抵抗运动领导人联络交流的內部小圈子。罗西和斯皮内利赢得了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邦迪的信任，通过邦迪，进而又结识了法国“抵抗统一运动”组织在日内瓦的代表让·玛丽·苏图。苏图促成了他们两人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总秘书长、荷兰抵抗组织与伦敦荷兰流亡政府之间的调停人威廉·A. 维塞尔特·霍夫特（Willem A. Visser 't Hooft）的接触^[14]（第136-149页）。霍夫特马上发现法国和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新欧洲思想，与自己多次表述过的观点竟不谋而合。他当即决定将自己在日内瓦的住所作为拟议中的这次会议的召开场所，但会议必须秘密进行，以免给希特勒提供侵犯瑞士中立的借口。

1944 年 3 月 31 日、4 月 29 日、5 月 20 日和 7 月 7 日,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和挪威等九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日内瓦四次聚会,为战后欧洲勾画一幅各国抵抗运动都能认可的联邦主义的蓝图。出席会议的有意大利代表 3 人,法国代表 2 人,德国代表 2 人(从第二次会议时开始参加)、荷兰代表 2 人,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和挪威各一名代表。由于大多数人使用的均是化名,1 名荷兰代表和后 5 国代表的真实姓名一直无从知晓^[12](第 178 页)。3 月 31 日的会议上,代表们采纳了“抵抗不仅意味着拒绝错误的价值观念,也意味着对积极价值观念的肯定”的原则,并据此一致通过了第一份宣言——“团结声明”。宣称因“同一原因所造成的一切牺牲和痛苦使得抵抗运动相互间产生了亲如手足的联系,在自由人民中诞生了新的欧洲团结的道德良知,维护这种团结将成为和平最基本的保证之一”^[13](第 677-678 页)。4 月 29 日的会议上,意大利代表提交的第二份宣言的草案,试图准确界定欧洲联合体的类型。讨论“显示了意见相当的不一致”,分歧不是要不要联合体的问题(这一点并无疑义),而是在于要个什么样的联盟问题。所有的与会者,除了丹麦、挪威代表外,明确地将超国家联邦视为基本的和无可争辩的原则。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一是“民族国家政府权力限制的范围”(法国、意大利代表期望走得更远),二是“英国和俄国与欧洲联邦的关系”。5 月 20 日会议经过讨论终于达成第二份宣言的折衷意见,即“关于欧洲联邦的宣言草案”。在这份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文件中,从 5 个方面论述了建立欧洲联合体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外交、经济和防卫职能在内的欧洲联邦政府,并规定任何保证民主体制和个人自由发展的欧洲国家或部分欧洲领土的国家均可获得成员国资格^[12](第 679-682 页)。5 月 20 日之后,两份宣言一起被尽可能多地送往各国的抵抗组织,并希望他们作出答复。在接下来的时间内,陆续收到了一些抵抗组织积极的反应,但在数量上比预期的要少。原因很简单,一是诺曼底登陆后,欧洲大陆迅即掀起了解放的高潮,而获得解放的地区又面临着建立新的政权结构的紧急任务。二是已经控制局势的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在所执行的政策中丝毫没有欧洲联邦思想的色彩。解放导致了民族感情的上升,流行的观点是盟国另有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决定了 7 月 7 日最后的一次会议无法产生新的成果。但是,在 5 月 20 日建立的负责联络的机构——“欧洲联邦筹备临时委员会”,却一直继续运转到 1944 年底,并出版了“联邦主义者欧洲”杂志。1945 年春,该委员会更名为“争取欧洲联邦行动中心”,他们把收集到的有关抵抗运动的文件和材料,以《明日之欧洲》为题整理出版^[12](第 665 页)。日内瓦会议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未能获得任何预计中的实际成果,但它却是联合起来的抵抗运动,渴求建立一个新欧洲的愿望的强烈表达。

抵抗运动是一场广泛的民众运动,它所提出的欧洲联合的诉求,也就是民众自己的诉求。正是抵抗运动,才把长期在知识分子为主的圈子里流传的欧洲思想,传播到社会的最低层和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并成为他们的自觉要求。从抵抗运动的规模这一点来推论,在战时至少有一部分人接受了欧洲思想。此外,抵抗运动对欧洲思想的丰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欧洲一统的思想自形成之日起,与对和平的追求始终密切相连。二战后,欧洲思想又增添了对繁荣的追求。二战中法西斯的侵略、独裁和暴政,则使欧洲人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欧洲仅有和平与繁荣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统一的欧洲还必须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这一新的思想原则的确立,对欧洲一体化的启动及其后来的发展,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参 考 文 献]

- [1] [法]亨利·米歇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 Lipgens, Walte.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1939—1950, Vol. 1, Continental Plans for European Union 1939—1945[M].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5.
- [3] Michel, Henri.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M]. Paris: P. U. F., 1950.
- [4] Kedward, Harry R. Resistance in Vichy France, A Study of Ideas and Motivation in the Southern Zone 1940—1942[M]. Oxford: U. P., 1978.
- [5] Aron, Robert. Histoire de Vichy 1940—1944[M]. Paris: Fayard, 1954.
- [6] Franc, Henri. Le Nuit finira. Mémoires de Résistance 1940—1945[M]. Paris: Laffont, 1973.

- [7] Frenay, Henri. *Combat*[M] . Paris: Société des éditions Denoel, 1945.
- [8] Craipeau, Yvan. *Les révolutionnaires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ontre vents et marées 1938-1945* [M] . Paris: Savelli, 1977.
- [9] Gerbet, Pierre. *La Construction de L' Europe*[M] .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 1983.
- [10] Institut Charles de Gaulle. *De Gaulle en Son Siècle, vol. 5 L' Europe*[M] . Paris: Plon, 1992.
- [11] Delzell, Charles F. *Mussolini's Enemies. The Italian Anti-Fascist Resistance*[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 [12] Lipgens, Walter. *Document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1939—1950. Vol. 2: Plans for European Union in Great Britain and in Exile 1939—1945*[M] .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86.
- [13] Room, Ger Von.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Count von Moltke and the Kreisau Circle*[M] . London and New York, 1971.
- [14] Hoof, Willem A. Visser' t. *Memoirs*[M] . London: S. C. M. Press, 1973.

(责任编辑 桂 莉)

Resistance's Aim and Opinion for the European Rebuilding after WWII

YAN Shuangwu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 Shuangwu (1957-),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Abstract: While fighting against the fascist invasion and tyranny, the Resistance positively drew the outline of the blueprint for Europe. They insisted that the European Rebuilding after WW II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ederalism instead of the political form of nation-state. The Resistance Movements not only widely broadcasted the European Idea, but also made it more enriched, which built the proper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WW II.

Key words: resistance; federalism; european idea; rebuilding europe